

從中央到地方： 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

陳耀煌**

摘 要

自從 1970 年代末期以來，西方中共黨史研究圈中出現了一股後來被稱為「地方研究」的新趨勢。新一代學者依據日益開放的中國歷史檔案資料，質疑過去的「大理論」研究，主張中國共產革命是一場因地制宜的地方革命。迄今為止，地方研究已成為西方中共黨史研究的主流。為何地方研究會興起？其主張為何？其中又有什麼值得吾人參考與商榷之處？本文將藉由梳理近三十年來與中共農村革命史相關的英語文獻，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關鍵詞：中共黨史、農村革命史、中國研究、地方研究、根據地研究

* 本文撰寫與修改期間，承蒙陳永發、康豹與沈松僑諸位教授，以及匿名審查人提供若干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惟文責仍應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09 年 12 月 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 年 2 月 3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壹、前言

1979年1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不僅大大改變了日後世界的外交版圖，同時也向西方人提出一個嚴峻的課題，即如何利用中國的逐漸開放來重新認識中國。不誇張地說，1950、1960年代冷戰高峰時期，「登上月球的美國人比獲准赴中國者還要多」，西方學者只能通過一些二手資料或流亡者的口述來認識中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愈來愈多的西方人得以親赴中國，並在相對於過去較不受到中國政府當局嚴密監控下觀察中國，蒐集資料，其結果當然會衝擊過去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關在象牙塔裡的學者同樣難以倖免。¹柯文(Paul A. Cohen)在1984年出版*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一書，²倡導中國中心觀，即與此一衝擊相關。當代中國與中共黨史研究圈受到的震撼更大，在歐洲、日本，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英語世界，即使稱不上「典範的轉變」(paradigmatic change)，然無庸諱言，一個新的研究世代已經出現。³

那麼，此一轉變的概要內容為何？據班國瑞(Gregor Benton)所言，自1970年代末期以來，研究中共黨史的西方學者不再拘泥於追求「大理論」(grand theory)，轉而從事以根據地為中心的地方研究。此一研究趨向迄今已成為西方中共黨史研究的主流，並發展到某種極致，以致以中國為單位的宏觀革命史研究在西方學術界已經絕跡。⁴日本學者高橋伸夫也注意到此一新趨勢，稱其為

¹ Harry Harding,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pp. 23-107.

²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³ 關於1980年以前美國、歐洲與日本的中共研究，請見：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M. E. Sharpe, 1989), pp. 3-33; Kjeld Erik Brø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David Shambaugh,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35-64; 伊藤一彦，〈日本の中国研究〉，收入野村浩一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3-53。

⁴ Gregor Bent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Chongyi Feng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 189.

微觀研究。⁵無論是地方研究或微觀研究，班國瑞或高橋所指的，都不是某個學派、某些特定學者或某種理論，毋寧是一種新的研究趨向、視角或方法。再者，此種地方研究並不總是根據地研究，它也可能以地方幹部或某一地方革命史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麼，地方研究究竟與過去的中共黨史研究有何差異？其特色何在？有沒有什麼值得再商榷之處？本論文的目的，即是藉由重新梳理過去三十年來，西方學者關於中共農村革命史的研究，試圖去回答上述問題。⁶

貳、地方化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興起的背景

西方學術性的中共黨史研究，如果從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於1951年出版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一書算起，⁷迄今也已超過半個世紀。最初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當時世界陷入冷戰格局，學者們急欲迫切回答為什麼共產黨勢力會如此迅速地崛起？其中，對於美國學者來說，他們還必須找出美國失去中國的原因，並進一步思考抑制共黨勢力的對策。在此一反共氛圍下，「極權主義典範」毫不意外地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⁸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等曾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革命是蘇聯領導的世界革命陰謀的一部份。中共傳承了聯共的意識形態與列寧主義的黨國組織，進行極權主義統治。這是一場由菁英（受蘇聯影響的知識分子）操弄的政治運動，群眾是被動的，他們在共黨的極權統治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而國民黨的失敗，一方面是由於抗日戰爭削弱了它的力量，再則由

⁵ 高橋伸夫，《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東京：研文出版，2006），頁177。

⁶ 西方中共黨史研究中，以農村革命史相關著作佔最大部份，也最為重要。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限於中共農村革命史主要相關文獻的探討。

⁷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⁸ Tai-chün Kuo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p. 17.

於「短視的美國政策制定者受到試圖幫助中共奪權的叛徒影響」。⁹因此，當時的研究焦點是放在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也因為取得相關資料的困難，歐美學者的研究集中在抗戰前的中共黨史上面。¹⁰

但並不是所有學者贊同此一觀點。如史華慈雖然承認列寧主義對中共的影響，但他更強調毛澤東如何利用農民的不滿，走出一條有別於莫斯科的農村革命道路。¹¹史華慈的老師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也認為中共並不只是莫斯科的傀儡，「共產主義在美國是不好的，在中國卻是有益的」。¹²他以為中共的土地革命與民族主義政策，滿足了貧苦農民與知識分子的要求，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¹³其他如芮瑪麗(Mary C. Wright)等人也秉持類似的觀點。¹⁴雖然這些學者承認中國是一個由極端的空想家所領導的極權主義社會，但他們仍對中國充滿期望，以為只要中國沖淡其革命意識形態，學習西方經驗，也可以走上現代化道路。因此，這些學者被稱為「自由主義中派」(liberal center)。¹⁵

到了 1960 年代，更多的學者對極權主義典範提出批評，其中以詹隼(Chalmers A. Johnson)於 1962 年出版的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一書最具代表性。詹隼並不否認中共極權統治的色彩，但他不認為極權主義典範所強調的組織武器能夠說明共產革命的動力；同樣地，詹隼也承認共黨的社經政策改善了農民生活的困境，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中共贏得群眾的主要原因。詹隼利用大量的日文檔案，指出日軍的入侵為中國農村帶來災難，使抗戰前菁英式民族主義昇華為群眾式民族主義。而中共的民族主義政策，以及它

⁹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 335.

¹⁰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pp. 10-11.

¹¹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p. 199-201.

¹²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p. 317.

¹³ John K. Fairbank,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ary Asia," *Foreign Affairs* 29:1 (October 1950), pp. 102-104.

¹⁴ Mary C. Wright,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 1900-1950,"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1 (January 1959), pp. 1-5;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and Communism," *Pacific Affairs* 24:3 (September 1951), pp. 256-265.

¹⁵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p. 39-46.

在日軍後方維持生存的能力，為他們贏得群眾普遍的支持。國民黨在抗戰時期的失敗，也使它失去合法性與民心，由此決定了國共兩黨的優勝劣敗。¹⁶

詹隼的著作很有代表性，但也相當具有爭議性。如芮瑪麗、史華慈等學者認為詹隼高估了中共民族主義的一面，以致低估了中國農村裡農民與地主、農民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共溫和的社經改革政策的重要性。1960年代中期，由於越戰與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左翼觀點開始受到一些年輕美國學者的青睞。他們把中國理想化，視中共為「革命的救世主」，領導對抗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勢力，還說文化大革命是創造正義社會的偉大試驗，全世界人民都將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團結起來。¹⁷這批年輕學者嚴厲批判老一輩學者的觀點，如佩弗(Richard M. Pfeffer)便諷刺詹隼的書是「社會科學偽裝下的政治宣傳」，說詹隼不了解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意義。¹⁸

另一位左翼學者賽爾登(Mark Selden)也不贊同詹隼的觀點。賽爾登比詹隼更反對極權主義典範，他提出的「延安模式」表現出強烈的去菁英化與反對國家威權的民粹主義色彩。他認為中共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緩和的社經改革政策，以及革命的民主機制，發動了一場寧靜的革命，既改善了農民生計，提高了農民的政治社會地位，又未過分背離菁英分子，由此獲得多數群眾支持。至於詹隼所強調的民族主義，雖然賽爾登也說，抗戰時期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第三世界反殖民抗爭的一個重大里程碑，中共的人民戰爭打破了日本企圖征服中國的計畫，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根據地網絡，為民族統一鋪平了道路。¹⁹但詹隼認為，這種說法是對中共政權最高形式的諂媚說詞。²⁰

¹⁶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30.

¹⁷ 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 52. 當時美國學者並非不清楚文革殘酷的一面，但認為文革中被迫害的生命與經濟的損失，都是為了達成公平正義社會的偉大理想下，必須且可以被容許的犧牲。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10 (October 1982), p. 939.

¹⁸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 *The China Quarterly* 72 (December 1977), p. 784. 在同時期的歐洲中國研究圈中也存在著相應的世代衝突。Kjeld Erik Brødsgaard, "China Studies in Europe," in *China-Europe Relations*, p. 52.

¹⁹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70 年代初，中美兩國外交關係開始走上破冰之旅，一些左翼學者得償宿願，親赴中國參訪。儘管當時中國方面嚴格限制學術交流，但這些「朝聖者」還是帶回令人振奮的消息，鼓舞了革命典範，弗里曼(Edward Friedman)在毛過世後就不無感嘆地說：「要是他能活久一點，也許能夠在更陡峭的山上開闢另一條更光彩的道路！」²¹然而，1979 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日益開放的檔案資訊，以及學者親身的參訪經驗，逐步地顛覆了左翼學者的觀點。許多人發現，毛澤東是瘋狂的，共產中國也不是一個公平正義的國度，黨國幹部的官僚腐敗，以及社會的不平等，甚至比美國嚴重。西方市場與報章雜誌開始流傳挖苦諷刺中國的報導與出版品，²²一些被視為右派的學者也出版論文專著，高呼西方人「誤解」了中國，批判過去的革命典範。²³妖魔化共產黨及其領導蔚然成風，甚至成為暢銷的保證，迄今仍影響著西方的出版界與學術界。²⁴

但是，在批判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同時，西方人仍對中國寄予很大的期待。許多人從後革命時代的中國發現，共產中國並非鐵板一塊，中央與地方自毛時代以來即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毛與其繼承者在執行其政策時，經常有意或無意地違背其初衷，擴大了兩者之間的分歧。如施拉姆(Stuart R. Schram)分析般，

pp. 92, 119-120, 277.

20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72, p. 784.

21 Edward Friedman, "The Innovator," in Dick Wilson,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9.

22 如 Fox Butterfield,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本書在出版的同一年即被翻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包德甫(Fox Butterfield)著，續伯雄譯，《苦海餘生》(台中：台報出版社，1982)。

23 在史學界最著名的例子即是 Ramon H. Myers and Thomas A. Metzger,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4 (July 1980), pp. 1-34, 該文曾引起西方學界極大爭議。

24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in Arif Dirlik, Vinay Bahl, and Peter Gran, eds., *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 Post-Eurocentric Historiographi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p. 127, 152. 作者舉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在西方的暢銷為例，證明其觀點。近年在許多國家暢銷的 Jung Chang (張戎),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Vintage, 2006)一書，也把毛描繪成一個道德淪喪、毫無節制的暴君，縱欲、殘暴、陰險。此一說法已遭陳永發等學者質疑。況且，李、張二人的著作雖然暢銷，但嚴格說起來，不能算是學術研究。

暴君毛澤東雖然模仿史達林建立了一個專制主義國家，試圖把大權抓在自己的手中，但也是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開啓了「去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的趨勢，下放許多權力到地方，破壞了正規官僚體制，高舉群眾路線，無意間促成後革命時期地方主義與民主的興起。²⁵毛澤東的革命失敗了，如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所言，毛時代是「歷史的脫軌」(historical aberration)。稱之為「脫軌」，一方面是因為他背離了近代以來中國不斷走上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²⁶再則因為他學習蘇聯推動計畫經濟，違背了游擊革命「因地制宜」的傳統，一體適用地強迫全國推行瘋狂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造成災難。因此，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一方面就是中國重新與世界市場經濟接軌，再則是中共有意無意地去中央化後，中央被迫或自願地重拾起游擊革命時期因地制宜的傳統，中央只規劃宏觀的政策，給予地方更多制定具體辦法與執行的權力。²⁷地方因此成為改革開放的急先鋒，中國前進的主要動力。學者們質問道：當代中國的重大變化，像包產到戶（如同 1962 年時的包產到戶），不是首先從地方由下而上發動的嗎？今天的中國社會，難道是毛澤東與鄧小平最初設想的結果嗎？當代中共中央的領導，除了被動地因應問題，以及戰戰兢兢地維持其唯恐喪失的統治權外，又能做什麼呢？²⁸

就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分歧日益擴大，以及領導者被負面評價等背景下，愈來愈多的觀察家把焦點轉移至地方與群眾。他們講的群眾，不再只限於過去中共官方馬克思主義所標榜的工農群眾，還包括那些具有地方、傳統特色，或被社會邊緣化者（如婦女、少數民族），這與西方人對共產中國

²⁵ Stuart R. Schram, "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pp. 125-143.

²⁶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in *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 p. 127.

²⁷ David S. G. Goodman,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3.

²⁸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52-254.

理想的破產當然不無關係。²⁹正如賽爾登與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觀察，當代中國群眾抗爭的勃興，不僅肇因於經濟發展所促成的社會差異，還源自性別、民族、世代與宗教的問題。而且群眾經常是在具有長久歷史淵源的地方「社群」(community，如宗族)基礎上，訴諸某些傳統話語與鬥爭策略(如宗教崇拜)，借用(appropriate)官方的法律與意識形態(如毛澤東時代階級鬥爭的口號)，發動抗爭，捍衛自身權利。³⁰直迄今日，中國的群眾抗爭仍未見稍歇，其標榜的口號像「維權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更是引起觀察家們無限遐想，以為反霸權的民主與公民權意識已開始在中國社會蔓延，³¹覺醒的草根群眾終將成為射穿共產中國「阿基里斯之踵」(官僚的貪污腐敗與無能)的英雄。³²當代中共領導察覺群眾日益升高的不滿，但又受限於黨國權力愈是下層愈見萎縮的現實，只得重拾因地制宜的傳統，恢復民粹主義的革命性格，成為一個既是中央集權，又關注農村等落後地區的農民等弱勢群眾，以及試圖達成社會公平正義的「民粹主義式威權主義」(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政權。³³

西方人對當代中國的觀察，難免與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相互對話與呼應。事實上，早在1970年代初，便有中共黨史學者提出中共黨國並非鐵板一塊的說法。黃宗智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夕，也具體地批判西方「北京學」

²⁹ 同時期印度倡導「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也有相同主張。其與本文所欲探討的地方研究之間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探究。Vinay Bahl, "Situating and Rethinking Subaltern Studies for Writing Working-Class History," in *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 pp. 85-124.

³⁰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2nd edition), pp. 8-11.

³¹ Kevin J.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6.

³² Elizabeth J.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8.

³³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p. 169-170. 狄忠蒲(Bruce J. Dickson)等人指出，江澤民時代較強調城市與菁英以及經濟發展，胡錦濤時期的中共則更注重農村與弱勢團體的問題，後者在維持中共一黨威權統治的前提下，推行了更多以達成社會公平正義為目的的民粹主義政策。Bruce J. Dickson,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 in Jae Ho Chu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p. 24.

(Pekingology)關於江西蘇維埃時期共產革命的研究，認為共產黨並非一部上行下效的巨大機械，理論與實際、政策與執行間，存在著極大差距。³⁴西方觀察家對中國地方的關注，以及「解構」(deconstruct)或所謂「去中央化」的主張，更為1980年代以後許多史家所標榜，如提出中國中心史觀的柯文，便倡導縱向與橫向地分解(disaggregate)中國，使地方歷史的研究成為可能。³⁵而為了要研究真正的地方以及群眾，學者如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等人主張借用其他學科的觀點，從文化、日常生活的視角，而不是像過去政治史般，由上而下，或借用外來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去切入研究革命史。³⁶也因為學者們開始強調中國內在的歷史文化動力，歷史的延續性成為一個熱門議題，甚至被當成價值判斷的標準。如前所述，毛澤東被妖魔化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在中共建國後，背離了中國傳統文化與近代中國所走的西方現代化道路，而199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也基於同樣的原因試圖為大陸國民黨政權翻案，如蔣介石就被視為推動現代化的新儒家。³⁷曾經一度被毛澤東的共產革命醜化的現代化與中國傳統，如今終於獲得了平反。³⁸

中國日益對外開放的歷史檔案，也為新一代學者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在過去冷戰時期，學者們只能借用某些大理論，佐以有限的資料，進行宏觀的研究。在今天歷史資料日益增多，乃至於氾濫的地步下，許多人依據這些新證據質疑過去的大理論。他們認為前人的研究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其缺點只在於試圖從單一的因果關係來理解整個革命，難免失之於武斷。一些老一輩的學者如史華

³⁴ Philip C. C. Huang, "The Jiangxi Period: An Introduction," in Philip C. C. Huang, Lynda S. Bell, and Kathy L. Walker, eds.,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 1927-1934*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p. 83-97.

³⁵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pp. 186-187.

³⁶ Jeffrey N. Wasserstrom,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view: Part I: The Evolution of a Field," *Social History* 17:1 (January 1992), pp. 1-21.

³⁷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筆者對本書的認識，得益於汪榮祖教授的評介，其論點後已成文發表，參見汪榮祖，〈評說陶涵蔣介石新傳〉，《傳記文學》，卷96期1（2010年1月），頁110-125。

³⁸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in *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 pp. 127-128.

慈便不無感慨地說：「往往一個簡單的事實就能殺死一套理論。」³⁹但也有少數學者如賽爾登仍堅稱，後來的地方研究只是進一步證實了他那被批評為大理論的延安模式，確實可以適用在陝甘寧邊區以外的中共抗日根據地，禁得起時間的考驗。⁴⁰

綜上所述，在長時期學術成果的積累，以及學者自身的反思下，兼之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更多新資料的衝擊等因素，西方人大大改變了其對當代中國與中共革命史的看法。本文所欲探討的地方研究，也就在此一背景下出現，並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

參、地方化的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

雖說地方研究是前人驀路藍縷的成果結晶，但現在學者談及中共農村地方革命史研究的萌芽時，通常是追溯至 1970 年代范力沛(Lyman Van Slyke)在史丹佛大學推動的根據地研究。范力沛於美國以中共研究而著名，他不滿意極權主義典範，在中美正式建交後，與中國學術界開展交流。他有感於大理論的失當，在 1984 年中國南開大學的演講上，嚴厲批評西方過去的宏觀研究是「山頭主義」、走馬看花，所以倡導根據地研究。⁴¹他的幾名學生，如研究新四軍華中與華東根據地的陳永發、研究八路軍山東根據地的鮑爾森(David Paulson)，以及同為史丹佛大學出身、研究晉察冀邊區的賀康玲(Kathleen Hartford)等人，也都承襲了范力沛的關懷趨向，積極投入根據地研究。如陳永發即指出，詹隼、賽爾登與片岡鐵哉(Tetsuya Kataoka)等人，同樣都執著於尋

³⁹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

⁴⁰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 E. Sharpe, 1995), p. 241. Carl Dorris 也主張延安模式的出現與中共在其他根據地的經驗不無關係，從另一方面承認了延安模式的普遍性。Carl Dorris,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68 (December 1976), pp. 697-719.

⁴¹ 范力沛，〈西方學者對抗日根據地的研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頁 96。

找單一的決定性因素來解釋中共的成功，他們的失敗在於不能了解共產黨如何在不同地區採取具體的策略來動員農民。陳認為，不論是民族主義、社經政策，都在中共的農村動員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能說哪一個是最突出的因素。⁴²有當代學者稱上述范力沛等人是「史丹佛集團」，推崇他們在根據地研究上開創性的貢獻。⁴³

1989年，賀康玲與戈迪溫(Steven M. Goldstein)編輯出版 *Single Sparks* 一書。該書的主旨，早已暗示在書名《星火》（令人聯想到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言）當中，就是要推動地方研究。正如該書序言所言：「新一代的中國研究者不再積極尋求宏觀的通則，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自己沉浸在地方革命環境的研究當中，去追尋地方革命的誕生、生存，及其毀滅。」⁴⁴這篇宣言詳細分析過去西方中共黨史研究的概況，後來也經常被標榜地方研究的學者所引用，成了一個里程碑。

那麼，地方化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有什麼特色呢？

1. 地方研究的主旨

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正如塞奇(Tony Saich)所言：「共產革命也是一場地方革命。」這並不是說地方研究一定是根據地或下層研究（如賽爾登雖從事根據地研究，但並不被當作地方研究），而是說共產革命的推進與成功取決於地方幹部能否靈活地根據不同的地方情境，將中央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具體實踐。⁴⁵前述 *Single Sparks* 一書便指出革命的成功與生存，關鍵在於黨能否使自身更適合於地方環境，而不是相反的情形。該書收錄的論文也充分呼應此一觀點，如梁思文(Steven I. Levine)認為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在東北地區推動

⁴²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8.

⁴³ Feng Chongyi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pp. 7, 20.

⁴⁴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p. 27.

⁴⁵ Tony Saich,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p. 1006.

激烈的土地革命之所以能有成效，是因為該地區佃租制度的普遍；賀康玲也指出，中共晉察冀邊區因為自耕農較多，所以不適宜執行過激的政策；鮑爾森則說，抗戰時期中共因為滿足了山東農民最迫切的地方自衛需求，獲得群眾支持，國民黨游擊隊則因為腐敗、墮落與殘酷的暴行，失去了群眾。⁴⁶由於革命是因地制宜的，所以就呈現了「多樣性」的風貌。⁴⁷

紀保寧(Pauline Keating)在 1997 年出版的 *Two Revolutions*，也是地方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她說中國共產革命有兩個面向：一是由上而下的黨國建設，一是由下而上的地方社群重建。前者展現了革命中威權的一面，後者則展現了團結、和諧，尤其重要的是，民主的一面。紀保寧說，過去中國封建王朝很重視這兩個面向的結合，此即地方自治的傳統，中共則是繼承了此一封建傳統。在中共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屬地區，由於長期的戰亂逃荒，地廣人稀，中共在這裡面對的主要課題不是如何解決階級矛盾，而是在重建農村的基礎上建設黨國。她說，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正是此一努力的表現。該運動在黨國由上而下的輔助下（如移民墾荒），動員農民由下而上的民主參與，既重建了地方農村，又打造了黨國基礎。正因為成功的合作化運動，當 1942 年後陝甘寧邊區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時，中共才得以依賴地方的自給自足渡過難關。由此看來，作者主要承襲了賽爾登延安模式的觀點。不同的是，紀保寧認為延安模式中的民主等特點，並非既存於中共革命的意識形態，而是黨因地制宜的政策有以致之。因此，作者不認為延安模式如賽爾登所形容般，放諸四海皆準。位於陝甘寧邊區東北部的綏德、榆林分區，與延屬分區不同，土地問題嚴重，地主勢力也較強大，所以該地革命勢力的建立需要更多的黨國力量由上而下地介入，但這也是中共因地制宜的結果。⁴⁸延屬與綏德地區展現出兩種不同的革命面貌，正體現了地方研究所謂「共產革命是一場地方革命」的特點。

⁴⁶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⁴⁷ 高橋伸夫，《黨と農民》，頁 180。

⁴⁸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41-243.

2. 去階級化的中國農村與共產革命

其次，因為革命是因地制宜的，所以學者主張我們應該先對革命發生的地方背景進行長時期(*long durée*)的探究。黃宗智關於中國小農經濟的兩本專著，被地方革命史研究者視為這方面的典範。他主張以微觀的社會研究與地方研究來擺脫馬克思主義或亞當·斯密等的「規範認識」，並宣稱革命前的中國農村並未走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也未如中共官方黨史所描繪般，出現階級矛盾愈益尖銳化的情形，而是呈現一種邊際報酬遞減的內捲化(*involution*)現象，農民生活每下愈況。⁴⁹

由於階級矛盾不是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階級剝削也不是農民苦難的首要來源，一些學者因此認為，中共採取的因地制宜政策，就不應該是根據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所標榜的暴力的階級鬥爭，而是緩和的、漸進的社經改革。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關於抗戰時期太行山地區的革命史研究中指出，在抗戰前期，中共在該地區並未推動激進的階級鬥爭，也能夠維持與閻錫山的統戰關係，地方幹部大多也是回鄉知識分子，以及少部份的地主、富農與中農階級。1939年前後，太行山區的中共與閻錫山的統戰破裂，開始強調唯成份論，大量拔擢貧、僱農，取代過去那些階級異己分子的領導，並積極推動激進的土地分配政策與暴力的階級鬥爭。此一不符合地方實際的左傾措施，背離了地、富與中農階級，促成反叛暴動事件，還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帶來經濟的困境。1941年以後，中共發動整風運動，著手糾正錯誤的左傾政策，強調中農而不是貧、僱農的領導，也不再過分打擊地富階級，並採取緩和的減租

⁴⁹ 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 (July 1991), pp. 316-317, 324.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1980年代以來，西方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更加多元化，有人認為中國近代農村經濟呈現停滯或衰落的趨勢，有人則持相反的意見。黃宗智屬於前者，不能代表整體西方學界的觀點。但是，如同李丹(Daniel Little)所言，大多數學者還是傾向認為民國時期的農村經濟是處於靜止乃至於惡化的情形。李丹著，張天虹等譯，《理解農民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的案例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204-244。不過，筆者認為，不論是悲觀或樂觀的看法，1980年代以後西方的近代中國經濟史研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試圖「去階級化」，否認近代中國經濟如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產黨所形容般，出現了嚴重的階級分化，至少說階級矛盾並不是近代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

減息與市場政策，取代激進的土地分配，漸進地削弱地主富農經濟。結果，中農成爲太行山農村主要的社會階級，同時也是根據地的主要領導。在這裡，革命反映了社會各階層不一致的利益，不再只是窮人的革命。⁵⁰

除了緩和的減租減息外，合理的稅制改革也是中共經常採取的因地制宜的社會改革政策。學者指出中國自發性(spontaneous)的農民暴動，主要目的是反對國家的苛捐雜稅，而不是地主的階級剝削，所以是超越階級的鬥爭。如白凱(Kathryn Bernhardt)認爲，江南地區的租佃制度雖然普遍，但地主勢力在國家政權的不斷深入下，已是日沒西山，中共的土改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農民抗租行動的對象，也由於國家承擔了地租仲裁者的角色，而由地主與私人催甲轉移到政府官員身上。⁵¹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也指出，清末民初中國國家權力的擴大與深入，既增加了農民的負擔，還破壞了農村既存的權力文化網絡，致使農民暴露在土豪、惡霸與貪污腐敗的地方政權剝削之下，國家既未加深對地方的控制，反而愈益與社會隔離，此即國家內捲化。而共產黨的成功正在於他們了解民間疾苦，滿足人民反捐稅、反土豪劣紳，以及反貪污腐敗的迫切需求（減租減息只是其次的任務），終結了國家內捲化。⁵²紀保寧與周錫瑞(Joseph Esherick)等人也認爲，稅制改革是共產黨在陝北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⁵³李懷印(Huaiyin Li)與劉昶(Chang Liu 音譯)等人則不加批判地重述了以上學者的看法，指出國民黨統治下的華北等地農村存在著嚴重的國家內捲化現象，中共利用農村既存的社群而非階級關係，動員農民，並藉由賽爾登所謂稅制改革等「寧靜革命」（過程是漸進的，結果卻是革命的）的手段，重建了農村秩序，因此獲得最終的勝利。⁵⁴

⁵⁰ David S. G. Good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⁵¹ Kathryn Bernhardt,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⁵²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50-251.

⁵³ Tony Saich, "Introdu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p. 1003.

⁵⁴ Huaiyin Li,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3. 地方菁英

農民會自發地集結在傳統社群下抵抗國家，這並不是說農民是天生的革命者，國家的壓迫必然促成革命的發生。史考茨波(Thea Skocpol)試圖從結構論的觀點來解釋近代的社會革命，認為近代國家無法渡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戰爭與經濟的危機，導致國家權力的崩潰，此一結構性因素，促成廣泛且不能避免的農民反對地主階級的社會革命。⁵⁵但這樣宏觀的結構論遭到地方革命史研究者批評。黃宗智便認為，以為革命前農村結構的變遷造成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並由此得出共產革命的必然性是錯誤的。因為結構變遷的結果有許多可能性，我們應注意客觀結構與行動者主觀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⁵⁶蕭邦齊(R. Keith Schoppa)關於浙江蕭山地方革命史的研究也指出，中國的革命是「無數地方革命的聚合體」，是地方情境、文化、人為因素與歷史偶然性之間互相作用的結果，其中人為因素尤其關鍵，因為沒有菁英的領導，農民即使再困苦，也不見得會起來革命。⁵⁷

但是，過去極權主義典範就是因為太強調菁英的作用，把共產革命當作一場受外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支配的菁英分子所操弄的革命運動，完全抹煞下層農民的作用，遭到嚴厲的批判。因此，如何談菁英與農民的關係，又不至重蹈極權主義典範的覆轍，是地方革命史研究的一個挑戰。⁵⁸

「地方菁英」(local elite)此一概念的提出，解決了地方革命史研究的困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1-352; Chang Liu,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i Delta, 1850-1949*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91-113, 164-196.

⁵⁵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⁵⁶ Philip C. C. 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17:3, pp. 324-327.

⁵⁷ R. Keith Schoppa, "Contour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a Chinese County, 1900-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4 (November 1992), pp. 791-794.

⁵⁸ 史考茨波後來承認中國的農民革命並不是由於客觀結構所促成的自發革命，但她也不認為中國農村存在強有力的社群，所以她認為農民需要革命組織的領導，但她也強調革命組織的領導與地方農民的利益並非互相衝突，而是相輔相成。見：Theda Skocpol, "What Makes Peasants Revolution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14:3 (April 1982), p. 363.

境。早期的學者也會用「菁英」的概念來研究黨史，但它主要是用來指涉革命的外來性格與城市起源，如史華慈便說，共產黨是由一群政治明確的知識分子（也就是菁英）根據外來的列寧主義所組成的政黨；⁵⁹另一方面，菁英也被當成革命的對立面，如裴宜理便指出，1920年代河南地區由地方菁英所領導、以反抗苛捐雜稅與自衛為主要目的的紅槍會等地方團體，對那些宣傳激進的土地分配政策的外來革命者充滿敵意，這也是抗戰前中共難以在河南立足的主要原因。⁶⁰但也有學者們發現，地方菁英不只是革命的敵人，也是統戰的對象。如賽爾登便說抗戰時期中共在陝甘寧邊區放棄了階級鬥爭，致力於建立一個包括地主等階級敵人在內更廣泛的統一戰線；陳永發也指出，抗戰初期新四軍為避免地方菁英和日本妥協，及為便利群眾動員之故，亦願意與地方菁英合作。但菁英終究要被取代與打倒，不同的是，賽爾登認為中共是藉由緩和的稅制改革與減租減息等政策，削弱菁英的力量，即寧靜的革命；陳永發則證明中共從未放棄階級鬥爭，一旦時機成熟，中共就會動員群眾鬥爭地方菁英（特別是下層之地方菁英），以重新分配權力、財富和地位。⁶¹

隨後，由於更多相關資料的開放，學者們發現，原來許多革命者本身就是農村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成員。前述蕭邦齊所謂「人為因素」，就包括返鄉的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如沈定一），他稱這些人是革命的催化劑。嘉比亞蒂(Fernando Galbiati)關於彭湃的研究則指出，這些菁英家庭出身的地方幹部，並非機械地依賴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技巧去操弄人民，而是與地方農民之間不斷地相互適應。⁶²已故學者韋思諦(Stephen Averill)是1990年代以後仍從事江西蘇維埃運動時期共產革命研究的少數西方學者之

⁵⁹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pp. 199-200.

⁶⁰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23.

⁶¹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pp. 99-103, 236-242;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409-410.

⁶²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一，他告訴我們，贛南地區早期的中共黨員，像是鄱陂縣的古柏、井岡山地區的龍超清等，大多是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成員。他們也都曾到城市求學，並受到新思想的影響，加入革命。回鄉後，這些革命者利用其關係與地位，以及他們所熟悉的地方矛盾（如土客衝突），發展革命勢力。⁶³從這些例子獲得啟發，韋思諦警惕我們，應該從地方社經環境與歷史脈絡中，去探尋革命發生或失敗的原因及其動力，不要只聚焦在上層政策與少數領導人物，這實際上也是地方化革命史研究的一個主旨——去中央化。⁶⁴

如同周錫瑞所言，中共從來就不是一部巨大整體的黨機械，所謂的「黨」，無論是哪一階層，「皆是一個歷史的產物，是文化的構築，是人群的集合」。儘管黨試圖擺脫社會的束縛，但事實上不可能，它必然受到所處社會的約束與影響，生長自農村而且在農村裡工作的地方幹部更是如此。⁶⁵作為一位地方人士，他們不得不有意無意地根據地方的實際情形，因地制宜地執行上層指示。

因為這些返鄉知識分子黨員會根據地方既存矛盾去進行動員，所以像裴宜理所謂外來革命者宣傳的激進土地政策背離地方菁英與農民的說法，就值得再商榷。吳應銑(Odoric Y. K. Wou)關於河南革命史的研究告訴我們，早期中共鄂豫皖蘇區的黨員許多也是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像吳煥先、鄭位三等），他們和紅槍會密切合作，最初也沒有宣傳土地革命。吳認為中國農村的

⁶³ Stephen C. Averill,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ry,"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282-304;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⁶⁴ Stephen C. Averill,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1995), p. 80. 去中央化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強調對非中心地區的地方革命史研究，像是賀康玲關於晉察冀邊區的研究，以及古德曼關於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研究，都標榜所謂的去中央化或去毛澤東神話。另外，過去被認為失敗的白區黨史，自 1990 年代以來逐漸受到重視，也是去中央化的一個表現，如 Kathleen Hartford, "Fits and Starts," in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pp. 144-174. 關於抗戰前河北革命運動的研究，以及 Patricia Stranahan,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關於抗戰前上海地下黨的研究等。

⁶⁵ 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í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p. 1078.

主要矛盾並非階級矛盾，農民參與革命的關鍵在於革命者能否滿足其具體與迫切的需求。後來中共在該蘇區推動集體農場、消滅富農等政策，背離了農民，招致失敗。抗戰爆發後，中共重回河南，他們像過去一樣，派遣知識分子回鄉動員，如曾擔任過紅槍會首領的吳芝圃，回到睢杞太地區動員紅槍會。即使在沒有回鄉黨員的地區，中共也積極尋求地方菁英的合作。鑒於蘇維埃時期慘敗的前車之鑑，抗戰時期的中共更強調和諧而非鬥爭、團結而非分裂、建設而非破壞。在地方菁英的合作下，中共得以成功地動員農民，藉由地方社群的機制，進行開荒、水利、查田等社會建設工作。幹部如採取過激政策背離地方菁英，將被斥為左傾，即使用緩和的合理負擔來加重富人負擔，以達成社會公平的政策，中共也是在向地方菁英保證該政策將帶給他們實質利益，並在這些人的支持下，才得以貫徹。如果說，革命是一個不斷試錯的地方化過程，地方菁英便是此一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⁶⁶

4. 共產革命與中國傳統

地方菁英幹部的因地制宜，不僅使共產革命去階級化，還使革命帶有濃厚的傳統色彩。陳志讓(Jerome Chen)告訴我們，湘鄂川邊界農民的苦難主要也是來自軍閥與國家，而非地主剝削。但因為該地交通不便，農民居住分散，不能形成強有力的集體組織與行動，亟須外來的革命者。地方土匪領袖出身的賀龍，在南昌暴動失敗後回到湘鄂西地區，憑藉地方上的關係，而不是土地革命的宣傳（這不是該地農民的迫切需求），動員家族或地方秘密會社、土匪等既存社群的親朋好友參加革命，建立根據地。從其行動看來，賀龍不僅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還是地方利益的捍衛者與浪漫的傳統義匪。由此可見，共產革命不只是一場外來革命，它也有中國傳統根源。⁶⁷

共產革命並沒有與中國傳統決裂，戴瑞福(Ralph Thaxton)在這方面有更系

⁶⁶ 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⁶⁷ Jerome Ch'en, *The Highlanders of Central China: A History, 1895-1937* (Armonk: M. E. Sharpe, 1991).

統的論述。他試圖用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道義經濟學分析中國革命，但其成名作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被懷疑扭曲史料，硬套理論，⁶⁸道義經濟學本身也被批評太過分強調草根農民，看輕外來革命者的領導。⁶⁹地方菁英的概念則彌補了道義經濟學此項缺點。戴瑞福在 1997 年出版的 *Salt of the Earth* 一書告訴我們，河北製販土鹽的鹽民長期以來便有反抗國家的傳統。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影響下，蔣介石「財政家族」領導的現代化國民黨國家機器，進一步向農村伸出其魔爪，鹽民生活日益困頓，不得不再走上與國家對抗之途。當此之際，一些地方菁英家庭出身的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濮陽的王從吾等，回鄉動員。作為菁英的角色，他們帶給鹽民現代革命組織與思想的領導；但作為地方人士，他們懂得利用地方長期反抗國家的傳統與既存的私鹽網絡進行動員。對於戴瑞福來說，後一個角色比前一個還要關鍵。⁷⁰

但所謂的中國傳統難免太抽象、龐雜，它有好的也有壞的一面，共產革命到底承繼了那一方面？賽爾登等人關於冀中饒陽縣五公村革命史的研究指出，抗戰爆發以後，中共回鄉知識分子黨員透過宗族、家庭等既存的地域網絡組織動員，並推動稅制改革等因地制宜的和緩務實政策，只是有限地再分配財產，還允許土地借貸和僱用勞工，也沒有禁止市場自由，更沒有撕裂地方社會，這是「理性的經濟政策」，是寧靜革命在延安以外地區的再複製。這一場革命改善了農民生活，又團結了地方菁英，為中共日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賽爾登等人認為，在此一過程中，革命與傳統農村文化中向上的、團結的一面和諧地結合在一起。⁷¹

⁶⁸ Ralph Thaxton,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陳永發，〈從 Ralph Thaxton 的研究論抗日時期中共在太行山地區及其附近的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3 (1984 年 6 月)，頁 333-386。

⁶⁹ Yung-fa Chen and Gregor Benton, *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Critique*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86), p. 11.

⁷⁰ Ralph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⁷¹ Edward Friedman, Mark Selden, and Paul G. Pickowicz,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9-51, 270.

在中共建國初期，中共領導仍採取因地制宜的辦法，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穩健地推行有限的合作化運動，也沒有禁止地方市場經濟，由此造就了一段「黃金時期」(golden age)。然而，在 1956 年前後，中共開始高呼社會主義高潮，不再像過去那樣因地制宜，而是試圖把他們從蘇聯學來的那一套計畫經濟，不顧地方差異，強行在各地執行，由此結束了黃金時期，也為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大災難。⁷²就像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一樣，共產黨建立了一個凌駕社會之上的黨國，背離了革命的初衷，也背離了中國傳統向上的、團結的一面，撕裂了農村和諧的秩序。如同戴瑞福所言，最初與中共合作、推動寧靜革命、知識分子出身的地方菁英黨員，在中共建國前後被消滅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地痞流氓出身的地方幹部，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與地位，唯上命是從，不顧地方民眾的安危，堅決執行毛澤東激進的政策。然而，群眾並沒有屈服，他們仍像過去面對國民黨政權般，集結在地方社群之下，訴諸傳統的鬥爭策略，或許是比較不明顯的形式（如偷竊、吃青等），但這些「弱者的武器」最後同樣迫使共產黨改弦易轍，乃至於改革開放。⁷³戴瑞福再次證明了毛時代不過是歷史的脫軌，地方與群眾有其深具歷史傳統的生活邏輯，不是任何外力能夠徹底消滅與轉變的。1980 年代以後，宗族、宗教，以及各式各樣過去被斥為封建迷信而遭到打壓的傳統文化，又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復興起來，正是一個例證。賽爾登等學者不得不感慨，這是永恆的「地方」(the eternal local)。⁷⁴

⁷² Mark Seld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t Transition," in Werner Draguhn,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s: Fif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pp. 82-97.

⁷³ Ralph Thaxton,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Huaiyin Li,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⁷⁴ Edward Friedman, Mark Selden and Paul G. Pickowicz,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84. 究竟改革開放後宗族、宗教的復甦是否為傳統的再現，在西方中國宗教史研究圈中也引起極大爭議。見：高萬桑，〈近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4（2006 年 12 月），頁 169-209。筆者感謝康豹教授提醒此一資訊。康豹，〈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社區宗教傳統的主要動態〉，《文史哲》（濟南），2009 年第 1 期，頁 58-74。一文也詳細地介紹了西方中國宗教史研究的概況。

肆、關於地方研究的幾點思考

以上是主張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地方化的某些學者提出的主要論點。當然，這些論點不能代表整個西方學術界，也不能說每個主張地方研究的學者都採取相同的看法。不過，類似的觀點確實為許多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者採用。這些論點，儘管都非常具有啟發性，但其中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再商榷之處。

如前所述，陳永發是地方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他的大作 *Making Revolution* 也被當作地方研究的代表作，但事實上，陳的觀點卻不能為大多數研究同好所接受。陳指出，在中共革命奪權的過程中，由上而下的黨國建立與由下而上的群眾奪權，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面向。⁷⁵但是周錫瑞不贊同陳的觀點，說陳太強調組織的力量，以及黨與農民價值觀的不同，「具體化」(reifying)了黨，會重蹈過去極權主義典範的覆轍。相反地，他主張我們應該解構黨，因為中共黨國始終是社會、群眾、既存歷史文化的一部份。⁷⁶如上所述，一些學者也認為，中共要到 1950 年代中期之後，才充分展現其由上而下的威權與陰暗面向，在這之前，由下而上的民主或民粹面向，一直凌駕於威權之上。⁷⁷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如果周錫瑞等人的批評屬實，那麼，類似此種視革命為威權與民主或民粹兩種性格此消彼長的歷程，不也是把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化，甚至走得比陳永發更遠嗎？

長期以來，在西方中共黨史的論述裡，「組織」一詞一直帶有負面的意味。強調共黨的組織力量，無異於說中國共產革命是一場沒有群眾基礎，帶有濃厚階級鬥爭色彩的外來革命運動，所以像陳永發般把組織與群眾等量齊觀的論點，就不免受到非難。這些學者並非否認組織的因素，但又害怕因為太強調組織的力量而遭到批判，論證時就難免顯得彘肘。如周錫瑞也承認，列寧與史達

⁷⁵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 499.

⁷⁶ 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pp. 1052-1079.

⁷⁷ Tony Saich, "Introdu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p. 1006.

林的蘇聯模式確實對中共革命造成深刻的影響，但主張要把這樣一個具有濃厚外來性格的革命，放在中國歷史情境中考察。⁷⁸在關於米脂縣楊家溝革命運動的論文中，周錫瑞指出，楊家溝是馬家大地主佔優勢的封建堡壘，中共於 1940 年佔領該地之初，邊區政府、地方政府與下層幹部在關於與地主統戰以及徵稅、運鹽問題上，有很大的矛盾。1942 年邊區開始整風懲奸後，這三方一致支持推動階級鬥爭，以轉移焦點，平息彼此間的矛盾。似此推論，令人匪夷所思。事實上，整篇文章裡描繪的共黨幹部忠實地執行階級鬥爭政策，並沒有突顯社會背景影響黨員行為此一面向，作者也承認楊家溝革命反映了黨國強制力量的重要性。但他仍堅稱正是如此依賴組織力量所發動的革命，背離了群眾，如土改時期開門整風、群眾批鬥基層幹部的言行便是其例。此一論證背後的邏輯即組織與群眾的二元對立論。事實上，群眾反幹部的行為乃各地土改的普遍現象，是中共有意發動者，組織與群眾兩者間並非如作者所設想般地對立。最後，作者還是批評陳永發等人把黨給「具體化」了（這裡批評的主要是陳永發，《延安的陰影》一書），但是，這篇論文反而令讀者得出這樣的印象，即組織力量確實是影響革命進程最關鍵的因素。⁷⁹

西方學者把組織力量與群眾動員二元對立，事實上反映了其背後結構主義的邏輯。如前所述，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階級矛盾不是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既然如此，那就沒有道理認為中共是依賴階級鬥爭獲得農民支持。因此，即使中共農村動員過程中確曾出現殘酷的階級鬥爭，但那只是黨員過分依賴組織力量的少數左傾偏差個案，絕不是革命的正道。⁸⁰

⁷⁸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January 1995), pp. 45-76.

⁷⁹ Joseph W. Esherick, "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Modern China* 24:4 (October 1998), pp. 339-377.

⁸⁰ 梁思文便是從結構主義的邏輯推論得出組織力量的重要性。他認為土地革命根本就不是東北地區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潮流，完全「是一群逗留在鄉間的城市『中堅』」（指中共），憑藉組織力量推動的階級鬥爭，所以共產革命的勝利是「組織力量的勝利」。Steven I.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3, 243. 因此，周錫瑞批評梁思文太強調組織的力量。不過，如前所述，梁思文後來在 *Single Sparks* 一書裡修正其觀點，認為土地革命所以在東北地區獲得成功，是因為該

所以，像陳永發所謂中共會短暫地與地方菁英合作，但同時也會利用地方矛盾，時機成熟時就發動階級鬥爭打垮地方菁英的觀點，就被認為是太過強調組織力量與黨及農民價值觀的差異。紀保寧就以爲陳主張「黨的政策支配與窒息了農民，1930-1940年代黨國威權與極權的野心有效地掩蓋了農民的聲音。」紀保寧批評，這樣的觀點忽視了中共會依據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調整其政策，以獲得農民支持，不見得總是強調階級鬥爭。⁸¹無論陳永發究竟有無提出紀保寧所批評的觀點，關鍵在於，紀保寧的看法確實反映了結構主義式的思維。

我們要問，特定的革命運動一定要產生在相應的社會經濟結構下嗎？另一位被紀保寧批評犯了與陳永發同樣錯誤的學者是畢仰高(Lucien Bianco)。畢仰高主張，特定的社經結構不一定會產生相應的社會運動，如租佃率高的江南地區農民並不會質疑租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經常是由於某一特殊事件（如政府的二五減租），才激發群眾的抗爭。而且抗爭的對象也不見得就是地主或租佃制度，因為群眾會由於菁英的操弄，將矛頭對準政府。⁸²這警惕了我們，社經結構與社會運動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自發的群眾運動更不能等同於革命。⁸³

據畢仰高的說法，運動的方向與菁英領導的主觀操弄不無關係。平心而論，地方研究並沒有忽視菁英的重要性——如地方菁英概念的運用。西方政治社會學近十餘年來也強調，社會運動發生的一個根本要素，是領導者如何主觀地簡化其外在世界，並賦予特定意義（如階級鬥爭），導引群眾抗爭的方向——此一過程稱爲「構框」(framing)。然而，此一觀點有一但書，那就是領導者爲了引起群眾的共鳴，必須採取某些既存的文化符號進行構框。因此，任何社會

地原來就普遍存在著租佃制度。但這同樣是根據結構主義的邏輯推論出來的結果。

⁸¹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pp. 9, 241.

⁸² Lucien Bianco, "Peasant Movements,"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70-328.

⁸³ Lucie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2001).

運動與革命都必然為其所處的情境所限，不能是天馬行空的憑空創造。⁸⁴如果此一說法屬實，那麼中共就不可能在向來被認為租佃率遠不如華南的華北地區發動土地改革。但事實上中共卻做到了，而且華北地區激烈的土改甚至為中共在國共內戰時期贏得大批群眾的支持，為其勝利奠定了基礎。為什麼？

裴宜理等人曾批評，西方學者太輕估菁英領導的作用了！許多西方學者雖然也談菁英，但根本只視菁英為群眾、歷史潮流的追隨者，而不是獨立的創造者。這樣的觀點，完全無法解釋為何毛時代的中國會出現如此多脫離歷史潮流的政治運動。⁸⁵前述的戴瑞福曾因為完全否認菁英的作用，遭到嚴厲的批判。他在 *Salt of the Earth* 一書中加入地方菁英的概念，但還是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中共在冀南地區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他們與地方鹽民長期反抗國家傳統的結合，以及合理的稅制與市場政策，既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外來的組織力量也只是其次。⁸⁶其他學者如馬茨(Robert Marks)與希爾(Kamal Sheel)也同樣援用道義經濟學來詮釋中國革命，他們研究的彭湃以及方志敏，也是地方菁英、回鄉知識分子，但他們也像戴瑞福般，強調地方菁英「地方」的一面，而非「菁英」的一個面向。⁸⁷西方學界稱他們為「威斯康新學派」，指其過分強調農民的作用，卻又不能有力地證明農民是主導革命方向的主要力量。⁸⁸就像裴宜理等人的批評般，戴瑞福等人的菁英只是群眾、歷史潮流的尾巴。

⁸⁴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ank Johnston and John A. Noakes, eds., *Fram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Framing Perspectiv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⁸⁵ Ron Aminzade, Jack A. Goldstone, and Elizabeth J. Perry,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n Ronald R. Aminzade et al., eds.,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6-154.

⁸⁶ Ralph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 pp. 321-322, 328.

⁸⁷ Robert Marks,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 Wisconsin Press, 1984); Kamal Shee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⁸⁸ Joseph W. Esherick and Elizabeth Perry,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pp. xxiv-xxv.

菁英的行動當然不能超脫其所處結構的限制，中共黨員最初下鄉動員時必須利用農民的話語進行宣傳便是個例子。但是，問題在於中國地方的情形太複雜了。周錫瑞早年相當同情中國革命，曾堅持認為革命前中國農村土地分配極不平均，但他也承認，關於土地分配的數據資料相當豐富，史學家可以很容易找出相應的數據去證明任何觀點，因此，中國農村究竟有無階級矛盾本身就是一場「數字遊戲」。⁸⁹但是，後來的學者一直忽略了周錫瑞的警告。賽爾登在1970年代論證延安模式時強調農村裡的階級矛盾，以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戴瑞福在1983年的成名作中也承襲道義經濟學的觀點，否定了商品經濟。但是，到了1990年代後，他們反而轉向認為中國農村向來存在著自發的市場經濟，中共的成功也在於他們支持農村市場經濟。馬若孟(Ramon Myers)則是一度主張革命前的中國農村存在著活躍的商品貿易，但現在他卻否定了此一論斷，說中國農村是自給自足經濟，因此方便了日後中共計畫經濟的推動。⁹⁰這些易變、爭論不休，乃至於自相矛盾的論證，無論誰對誰錯，正足以說明中國地方農村的複雜性。

所以，當我們研究地方或群眾的歷史時，不能不自我警惕，即沒有一個統一的地方，也沒有整體的群眾。德里克(Arif Dirlik)主張用社群觀念取代外來的階級觀念，如此就可能認識真正的下層群眾。但是，不管社群是翻譯自英文的community，還是日文的共同體，難道不也是外來的觀念嗎？那些乍看之下統一的農村社群，其內部就沒有矛盾而會予共產黨滲入並加以分裂的機會嗎？吳應銑說中共會藉由與農村地方菁英的統戰，拉攏整個社群加入革命。紀保寧認為賽爾登及吳應銑所強調的中共與非黨菁英間的超階級合作，以及陳永發所主張中共對非黨菁英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同樣存在於陝甘寧邊區，但她認為在延屬分區，中共基本上是如賽爾登所形容般，較傾向團結與合作。吳應銑、

⁸⁹ Joseph W. Esherick,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4 (October 1981), pp. 387-411.

⁹⁰ Ramon H. Myers,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Life in Republican China: From World War I until 1949,"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s*, pp. 1-22.

紀保寧等人的觀點，皆是以中國農村存在一個統一的社群為前提，但此一前提和過去馬克思主義視階級為一個整體般，都是有待商榷的假設，不應視為理所當然。

因為中國農村如此複雜，所以我們既不能說階級矛盾是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也不能說不是。陳永發認為，對於毛澤東來說，矛盾無所不在，加上所謂的階級矛盾，本身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觀念，任何矛盾都可以被詮釋成階級矛盾，並據此動員農民去鬥爭任何階級敵人，正所謂有矛盾的地方就可以發動階級鬥爭。因此，租佃問題不過是個「重要的『次要』問題」，因為中共能夠利用任何矛盾進行動員。⁹¹在這裡，行動者與客觀結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革命者在既定的時空背景下推動革命，但卻又不受限於其所處環境，而是創造了一個新世界。所以，革命是一場辯證的歷程。

因此，我們在解構黨國的同時，也必須要解構中國地方社會。中共不是一部上行下效的巨大黨國機械，中國地方社會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嘉圖(Dagfinn Gatu)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社會結構變動不居的背景下，地方幹部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因地制宜，因為任何政策都可能獲得社會一部份人的支持，並招致另一部份人的反對。結果地方幹部經常訴諸高壓的組織力量，以迅速地完成任務。⁹²但是，這種做法並非中共中央所贊許的。因為中共相當清楚，中國地方差異性極大，所以他們也給予地方幹部執行政策上相當的自主空間，此即因地制宜。但是，這並不是與黨國對抗的因地制宜。要知道，中共長期奉行民主集中制，對他們來說，民主與集中兩者相輔相成，絕不是不能相容的「兩難困境」。⁹³所以，整個中國共產革命是威權與民粹相輔相成並進的歷程，

⁹¹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39, 516.

⁹² Dagfinn Gatu, *Village China at War: 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Vancouver: UBC Press, 2008), p. 433.

⁹³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該書中，西方學者承認在某些方面，1950年代前期確實是所謂黃金時代，但又指出當時中共已展現相當威權高壓的一面，表現了國家與社會、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兩難困境。

1956年前後，並沒有所謂民粹向威權突變的轉折，毛澤東時代也不再是歷史的脫軌。在大躍進中，我們看到了更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加強了黨國的力量，並沒有促成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說：「新政權是建立在舊政權的基礎上。」中共統治如此廣土眾民的國家，不可避免要面對某些與過去國民黨政權，或更早的封建王朝同樣的課題。到今天為止，我們仍不能明確說明共產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或在哪些方面，延續了過去。正如周錫瑞所指出，中國農村如此複雜，相關資料又是汗牛充棟，我們不難從中找出相應的資料，去證明中共消滅了長期困擾過去舊政權的地方「中間人」(middleman)問題，⁹⁴並指出中共農村幹部更加認同與地方利益相衝突的黨國政策，成了中共的共犯，⁹⁵或者質疑中共黨國根本就沒有深入農村，中共的地方幹部在某些方面不過是封建士紳的翻版，⁹⁶還是像賽爾登等學者般辯稱中共販售鴉片的行徑，⁹⁷以及蘇區與紅軍內部存在的性汙濫問題等現象，正足以證明「革命自身的解體」，⁹⁸即共產黨並未根本改造中國社會與民眾，革命在相當程度上仍是過去的延續。然而，在證明革命自身解體的同時，我們不得不追問：如果共產黨與國民黨及其他黨派並非截然不同，那為什麼是它獲得最後的成功？

不論斷裂抑或延續，不能否認的是，黨是我們在研究中共革命史時不能不

⁹⁴ 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02-106.

⁹⁵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9.

⁹⁶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9.

⁹⁷ 1980年代以前的學者以賽爾登為代表，主張中共是依賴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渡過戰時的難關，但後來陳永發則證明了鴉片貿易才是抗戰後期陝甘寧邊區之所以能夠渡過財政難關的關鍵。見：Yung-fa Chen,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pp. 263-298。賽爾登對此則反駁說，他和另一本強調自給自足經濟的著作 Peter Schran,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6)從來沒有說自給自足政策取得了任何經濟上的「突破」，而且賽氏還認為鴉片貿易正好證明了中國共產革命與過去的延續性（即承繼了軍閥與國民黨政權的某些特質）。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pp. 247-249.

⁹⁸ 高橋伸夫，《党と農民》，頁182。

重視的一個主要因素。在這裡，「黨」不必然是指有形的黨組織，它指的是列寧主義裡超越一切的權威概念，有時具體化為黨組織，有時則集中表現在某些個人（如毛澤東）或集團的身上。史華慈在天安門事件後提出了一個無解的難題，究竟深層的社經、文化結構，抑或某些領導人或政治權威，是推動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主要力量——沒有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會爆發嗎？⁹⁹沒有一個學者敢於否認任一個因素，但今天的地方研究卻傾向於忽略黨的影響，以致陷入了困境。韋思諦試圖從贛南地區的歷史脈絡與地方情境中，重新探尋推動共產革命的動力，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無法找出充分的證據，證明既存的地方因素較上層的政治力量更大地影響了革命進程。¹⁰⁰我們今天固然不能忽略既存社會背景的因素，但也必須承認，政治軍事力量上的優勢，黨國政權的建立，是共產黨能夠推動任何因地制宜政策的前提。¹⁰¹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黨史地方化並非西方學術界獨有的現象，在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也出現了同樣的趨勢。¹⁰²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領導鄧小平等人高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的旗幟，試圖打破過去獨尊毛澤東領導以及被四人幫壟斷的黨史解釋權，並同時抬高自己在黨史中的地位。古德曼等人便不諱言地說，抗戰時期太行山根據地研究所以成為可能，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該根據地出身的鄧小平、薄一波等人，在改革開放後成為中國的新領導者，他們自認為過去在毛時代的黨史中沒有受到公正的評價，還遭到批評與扭曲，因此刻意推動太行山黨史的研究，為自己平反，並從歷史來證明其領導地位與改革政策的合法性。¹⁰³其他如陳毅與新四軍歷史研究

⁹⁹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pp. 257-268.

¹⁰⁰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陳耀煌，〈高地的革命：中國的井岡山根據地——評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8（2007 年 12 月），頁 201-207。

¹⁰¹ Hans van de Ven,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odern Asian Studies* 30:2 (May 1996), pp. 247-248.

¹⁰² 龔育之，〈關於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北京），1995 年第 6 期，頁 7-11。

¹⁰³ 古德曼宣稱，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後，恢復了因地制宜的傳統，還有他過去在太行山地區所採取的資本主義式經濟。David S. 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的推動，也是出於同樣因素。¹⁰⁴令人不無感慨，今天強調地方研究的西方學者，是否如何漢理(Harry Harding)批判的那樣，也像讚揚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的1970年代西方學者一樣，陷入中共官方宣傳的神話而不自知？¹⁰⁵

就表面上看，中西雙方學者同樣強調黨史研究的地方化，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但如果我們再深入探究，那恐怕就要分道揚鑣了。因為，西方學者在強調地方化的同時，有時走上非此即彼的觀點，把中央與地方對立起來，但中國研究者卻是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下進行地方研究。當代地方黨史工作者在突顯與平反地方黨史時的一個主要依據，即是地方黨部如何堅持黨的領導與中央或毛澤東的正確路線。¹⁰⁶他們承認革命是集體創作，反對獨尊毛澤東的領導，但並沒有否認毛澤東早年領導革命的正確性，更沒有否定黨領導的必要性，地方政策的正確與否，還是取決於有否違背黨中央與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究其實質，他們認為，黨的領導是中國地方民主的前提。

伍、結 論

塞奇在1990年代時多次到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期間他看到了鄉間居民仍像傳統中國人民一樣，進行著某些過去被視為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的儀式。他還看到在革命聖地延安，官方出版純為歌功頌德的毛澤東傳記乏人問津，反倒是在街角攤販上兜售的領導人秘史吸引了遊客的注意。他驚呼地說，中國不是一個龐大的整體，「現實政治學在中國是地方政治學」，就像他在1994年說的「中國革命也是一場地方革命」一樣。¹⁰⁷但真的只是如此而已嗎？

地方黨史研究經常提到「生態學」(ecology)一詞，用來強調地方情境對革

¹⁰⁴ Feng Chongyi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pp. 1-6.

¹⁰⁵ Harry Harding,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Asian Survey* 22:10, p. 955.

¹⁰⁶ 如廣東黨史研究者試圖證明：1950年代廣東黨領導葉劍英、方方等人從未曾背離黨中央、毛澤東的路線與指示，以此來反駁過去對廣東黨「地方主義」的批判。見：張江明選編，《廣東歷史問題研究——廣東「地方主義」平反研究資料》（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2000）。

¹⁰⁷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2nd edition), pp. XV, 1-2.

命的影響。不過，對西方中共黨史研究稍有認識的人都清楚，最早以革命生態學聞名的是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在 1969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諷刺的是，該論文雖名為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生態學，但它的結論卻否認了革命的成功與其所處的社經環境有明顯的連繫，而主張革命的成功與否一定跟黨組織的存在有關，該論文也因此被批評為太強調組織的力量。姑且不論其結論與相關批評的對錯與否，作者在論文的開頭卻有一段頗值得玩味的話。他說，雖然革命的多樣性使得我們很難得出任何的總體理論，但是在我們投入到大量的地方資料以前，應該先停下來問問自己究竟在尋找什麼，並且試圖去獲得一個整體的革命圖像。因為，對於中共領導來說，革命鬥爭有其一致性與整體性。¹⁰⁸也許，這樣的說法並非沒有道理。

中共是帶著一個整體的革命圖像去搞革命，筆者認為，學者們事實上也難以避免是帶著某些宏觀的理念投身地方研究。如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一書重述了賽爾登在延安模式中提出的論點，戴瑞福則是在 *Salt of the Earth* 中重新證明與修正了道義經濟學的論點。他們似乎都只是用地方的個案去重新驗證某些宏觀的理念。這不禁使人懷疑，事實上的地方研究是否有可能？

我們並非主張要如同鐘擺般似地回到 1980 年代以前的大理論研究，相反地，筆者以為將來的革命歷史研究仍必須以具體的個案研究為致力的方向。1960 與 1970 年代時，魏復古與佩弗等學者，先後從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角度出發，引經據典地批判史華慈、施拉姆與邁斯納(Maurice J. Meisner)等學者關於毛澤東思想背離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作為歷史學者，

¹⁰⁸ Roy Hofheinz,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45,"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 5. 但是，霍夫海因茨也指出其中幾個例外地區，如作為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心的湖北黃安與麻城縣，其社會背景與共產革命的爆發有密切關係。羅威廉(William T. Rowe)則據此進一步指出，該地革命與暴力文化的傳統和記憶也有相當聯繫，並說鄂豫皖蘇區的國共鬥爭，是傳統暴力文化的再現，而不是有組織的抗爭。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令人好奇的是，在其他地區的革命歷程中普遍存在的暴力行為，是否也都是地方暴力文化的再現？筆者感謝陳慈玉教授提供此書的相關訊息。

史華慈等人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原典的掌握上恐怕不如魏復古等人，但他們充分利用了歷史學的優勢，把毛澤東思想與共產主義運動放在中國的文化背景與歷史脈絡中予以考察，這是魏復古等學者做不到的。¹⁰⁹史華慈等人的做法，也正是地方研究的主旨。正如史華慈所言，我們再也不可能回到過去大理論的時代。如何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把革命與其所處的社經、文化、歷史背景結合在一起，進行具體的研究，這正是革命史研究的使命。

當然，所謂大理論與地方研究並不總是非此即彼。就像組織與群眾、鬥爭與團結這些力量與性格，它們經常是並存於革命的進程中，相輔相成，並行不悖。所謂的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也不必然是處於對立的狀態。學者們在進行論述時難免顧此失彼，但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它都是歷史，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歷史多元性的價值也在於此。

¹⁰⁹ 尚慶飛，《國外毛澤東學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 54-82。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包德甫(Fox Butterfield)著，續伯雄譯，《苦海餘生》。台中：台報出版社，1982。
- 李丹(Daniel Little)著，張天虹等譯，《理解農民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的案例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 尚慶飛，《國外毛澤東學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 張江明選編，《廣東歷史問題研究——廣東「地方主義」平反研究資料》。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2000。
- 高橋伸夫，《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東京：研文出版，2006。
- Averill, Stephen C.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 Bernhardt, Kathryn.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ianco, Lucien.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M. E. Sharpe, 2001.
- Brown, Jeremy,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utterfield, Fox.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 Chang, Ju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Vintage, 2006.
- Ch'en, Jerome. *The Highlanders of Central China: A History, 1895-1937*. Armonk: M. E. Sharpe, 1991.
- Chen, Yung-fa, and Gregor Benton. *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Critique*.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86.
- Chen, Yung-fa.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Dirlik, Arif, Vinay Bahl, and Peter Gran, eds. *History after the Three Worlds: Post-Eurocentric Historiographi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Draguhn, Werner,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s: Fif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 Duara, Prasenjit.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 Feng, Chongyi, and David S. G. Goodman, eds. *North China at War: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volution*,

-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Friedman, Edward, Mark Selden, and Paul G. Pickowicz.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Friedman, Edward, Mark Selden, and Paul G. Pickowicz. *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albiati, Fernando.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atu, Dagfinn. *Village China at War: The Impact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Vancouver: UBC Press, 2008.
- Goodman, David S. 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Goodman, David S. G.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 Hartford, Kathleen,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M. E. Sharpe, 1989.
- Johnson, Chalmers A.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Johnston, Hank, and John A. Noakes, eds. *Frames of Protest: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Framing Perspectiv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 Keating, Pauline B.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uhn, Philip A.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Kuo, Tai-chün,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 Levine, Steven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i, Huaiyin. *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 History, 1948-200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iu, Chang.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i Delta, 1850-1949*.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Madsen, Richard.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 Marks, Robert.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 Wisconsin Press, 1984.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erry, Elizabeth J.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2nd edition.
- Perry, Elizabeth J., and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Rowe, William T.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aich, Tony.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2nd edition.
- Saich, Tony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1995.
- Schran, Peter.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76.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Schwartz, Benjamin I.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elden, Mark.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Selden, Mark.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 E. Sharpe, 1995.
- Shambaugh, David.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Shambaugh, David, Eberhard Sandschneider, and Zhou Hong, eds. *China-Europe Relations: Perceptions, Policie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Sheel, Kama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hue, 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tranahan, Patricia.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axton, Ralph.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axton, Ralph. *Salt of the Earth: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Peasant Protest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Thaxton, Ralph. *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Wou, Odoric Y. K.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Yang, Dali L.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二、論文及專文

汪榮祖，〈評說陶涵蔣介石新傳〉，《傳記文學》，卷 96 期 1，2010 年 1 月，頁 110-125。

范力沛，〈西方學者對抗日根據地的研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高萬桑，〈近代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宗教政策與學術典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4，2006 年 12 月，頁 169-209。

康 豹，〈西方學界研究中國社區宗教傳統的主要動態〉，《文史哲》（濟南），2009 年第 1 期，頁 58-74。

陳永發，〈從 Ralph Thaxton 的研究論抗日時期中共在太行山地區及其附近的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3，1984 年 6 月，頁 333-386。

陳耀煌，〈高地的革命：中國的井岡山根據地——評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8，2007 年 12 月，頁 201-207。

龔育之，〈關於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北京），1995 年第 6 期，頁 7-11。

伊藤一彥，〈日本の中国研究〉，收入野村浩一等編，《現代中国研究案内》。東京：岩波書店，1990。

Aminzade, Ron, Jack A. Goldstone, and Elizabeth J. Perry. "Leadership Dynamics and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n Ronald R. Aminzade et al., eds.,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Averill, Stephen C.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ry."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Bianco, Lucien. "Peasant Movements."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Dickson, Bruce J.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rategies of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 In Jae Ho Chung,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 Dorris, Carl.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Yen'an Commu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68, December 1976, pp. 697-719.
- Esherick, Joseph W.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4, October 1981, pp. 387-411.
- Esherick, Joseph W.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pp. 1052-1079.
- Esherick, Joseph W.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1, January 1995, pp. 45-76.
- Esherick, Joseph W. "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Modern China* 24:4, October 1998, pp. 339-377.
- Fairbank, John K.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ary Asia." *Foreign Affairs* 29:1, October 1950, pp. 101-113.
- Friedman, Edward. "The Innovator." In Dick Wilson,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hina Quarter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Goodman, David S. G. "The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Harding, Harry. "From 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22:10, October 1982, pp. 934-958.
- Hofheinz, Roy.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45."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 Huang, Philip C. C., "The Jiangxi Period: An Introduction." In Philip C. C. Huang, Lynda S. Bell, and Kathy L. Walker, eds.,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 1927-1934*. Berkeley: Center for

-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 Huang, Philip C. C.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 July 1991, pp. 299-341.
-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Biography of a Book." *The China Quarterly* 72, December 1977, pp. 766-785.
- Myers, Ramon H., and Thomas A. Metzger. "Sinological Shadow: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4, July 1980, pp. 1-34.
- Saich, Tony.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pp. 1000-1006.
- Schoppa, R. Keith. "Contour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a Chinese County, 1900-195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4, November 1992, pp. 770-796.
- Schram, Stuart R. "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pp. 125-143.
- Skocpol, Theda. "What Makes Peasants Revolution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14:3, April 1982, pp. 351-375.
- van de Ven, Hans.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Modern Asian Studies* 30:2, May 1996, pp. 225-269.
- Wasserstrom, Jeffrey N.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view: Part I: The Evolution of a Field." *Social History* 17:1, January 1992, pp. 1-21.
- Wright, Mary C. "The Chinese Peasant and Communism." *Pacific Affairs* 24:3, September 1951, pp. 256-265.
- Wright, Mary C.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 1900-1950."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21, January 1959, pp. 1-8.

**Localizing Revolution:
A Critical Overview of Wester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Past Thirty Years**

Chen Yao-huang*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70s, “local stud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in the West. As ever more archival material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became available, new research began to draw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grand theory” approach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rguing that the revolution was in essence a congeries of local revolutions that was adapted to the complex Chinese local reality step by step by local party members. Local studies have indeed now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field. Why did the local studies approach spring up? What did the proponents of local studies advocate? Should there be any more detailed deliberation on their argument? This article will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y examining the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from the past thirty year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of rural revolution, China studies, local studies, base area studies

*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